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激活与生长》绪论第三节（2）

## 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激活与生长》绪论第三节（2）

2004-12-11 樊卫国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672

### 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激活与生长》绪论第三节（2）

### 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激活与生长》绪论第三节（2）

结语：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

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现代经济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经济变迁、进化的一个缩影，包含着中国经济变革的许多“生长”信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其本质是发展的形态和路径问题。

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形态和早期现代化的特点，学术界颇有不同的断识。

本书主要是对上海现代经济的某些方面进行若干分析，在行文中作者产生了一些有关发展的宏观性的思考。这些思考在前章分析中有所涉及，这里加以一定的概括和阐发，以此作为结语。

#### 一、发展形态：对二元结构特点的思考

二元结构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不仅在后起国家，在先行的发达国家也存在过二元结构的形态。二元结构成为发展问题主要出于非欧美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为国民经济中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组合。这种二元结构是由于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和收益不同所致，是一种经济运动的过程现象。刘易斯的概念为经济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模式。晚清开埠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确实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但二元结构的发轫和演进的历史状况和刘易斯的经典论述不尽相同。其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中二元结构的个性是怎样形成和体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的，它对上海早期现代经济的影响如何？

经济史名家吴承明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二元结构集中表现为口岸城市与内地农村的对立。这在表现形式上概括了中国二元结构的特征。近代中国这种二元结构形成的内在根据是中国原有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现代经济的外激性，其外在因素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半边缘”结构的规定性。近代中国的二元结构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全球化资本积累的一种进程；其结构内部既是口岸工业与内地传统经济的截然分布，也是外国资本与中国本土经济的对峙。受到双重制约，口岸化二元结构的特征表现为广大农村的封闭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经济关系大量存在，农村租税、高利贷等封建剥削沉重；进出口、城乡工农业产品的双重剪刀差，内地资金和农村剩余外流，在商业化的侵蚀下农村经济的枯竭与口岸资本的积累呈反向运动。现代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力量弱小，无力向农村推进，农村新式经营难以展开，经营地主、富农、资本主义农场均未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成分，一些经营地主向封建地主倒退转化<sup>①</sup>。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广大内地的传统经济在演化，但没有进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① 据黄宗智研究，近代中国北方冀鲁地区的经营地主一般拥有100—200亩耕地（南方可能更少点），当其拥有的土地继续增加时，由于技术和管理的原因，经营效益下降；所以经营地主“变得愈大愈富有，便愈会放弃直接的经营，转而出租土地和进行商业及其他活动。”北方的经营地主、富农所占的耕地约为耕地总数的10%。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79页。

化；只有依据本性的发挥和变化，没有质的更替。无论外部市场关系多么变化，支撑各地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和动力存在于各地内部。只有本地区经济实力增长了，形成对称性的互动，才能有效地吸收外部的积极因素，抵制不良影响。而内地农村在双重制约下，只有市场渗透，没有技术扩散、结构变迁，农村的停滞，甚至倒退，与口岸的极化发展同时存在。

在“半边缘”的市场体系下，口岸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局部优势”不断强化，口岸经济的极化发展成为一种运作机制，生产要素的均衡流动被限制。在市场“自由化”的环境中，由于口岸经济组织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和不平等交换，近代上海发展具有向心力的倾向，在口岸市场体系的作用下，技术进步的成果全部或部分地向上海经济中心转移，再由上海口岸部分向国外转移。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体系和“半边缘”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口岸的利益向心力倾向导致民国后中国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东南口岸与中西部农村差距进一步拉大，内地农村始终处于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之外。

市场规律不具有社会视野和宏观视野，不具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调节能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强制和惯性力量下，落后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农村无法摆脱市场自发作用下的不利状态，使经济处于不断的恶化之中。

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个基本规律，但当非均衡达到相当程度时不仅使内地农村的经济陷于困境，也会影响制约先行发展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不断硬化的二元结构使20世纪以来上海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了这一问题，至二三十年代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商品市场的扩展，投资空间的选择，生产原料的供给，商业金融的扩散等方面，上海的现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受到了重大的制约。聚集和扩散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机制。聚集是为了扩散，扩散是为了新的聚集，只有不断地扩散，才能不断地聚集，扩大扩散才能扩大聚集。上海早期现代经济是在资源的聚集与流动中兴起的；近代上海的发展有一个不断集优的过程，聚商成市，聚众商成中市，逐渐形成聚集复聚集、优势生优势的经济优化机制。在聚集功能强化的同时，由于资源要素的单向调配，扩散的功能却在减退。上海向内地或农村的资本、技术扩散极少，周边江浙地区的一些工业，往往是上海口岸城市工业的附属加工业，与当地经济的关系甚少。这些加工产品或初级产品与都市工业制成品交换往往是不平等的，因为存在着卖方垄断和经济实力、组织形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正是由于扩散功能的衰退，在二三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其发展脱离内地城乡的脆弱性和浮根性日益暴露出来，上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难以扩张，既难以扩大资源要素配置的范围和构建更大的经济协作体系，也难以形成更大的经济优势。20世纪后，上海现代化经济发展受到日本产品和日本资本的严重竞争，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为上海扩散功能的缺陷，制约了上海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了上海扩散功能的发挥，而上海扩散功能的弱化又进一步助长了二元结构的背向演化。这可谓近代中国二元结构的又一特点。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注重的是一种经济布局的空间结构。在近代中国和上海的经济发展中，二元结构不仅是发展过程的一种外显结构，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内在形态。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的二元组合，始终存在于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这种贯通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形态可称之为“内质化二元结构”。

“内质化二元结构”是后起的模仿式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是落后的经济基

础、生产力水平与外来的先进技术、先进经济形态之间组合的必然结果。这种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生产部门、生产技术的构成上，而且表现在经济社会、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如表现在先进生产力与旧式管理上，表现在新式企业营销与落后的市场制度上，表现在新型企业家与守旧官员的社会政治关系上，等等。从宏观国民经济部门到微观企业运行和个体生产，二元组合是呈现其间的“全息现象”。在现代经济发达的上海，这种二元组合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大型企业集团与弄堂小厂并存；在生产方式和企业管理上，表现为大机器生产与传统手工制作、现代化企业科层制度与封建把头、家族式管理同构，企业经营者的二元人格和多重价值观念；在市场流通体制上，表现为现代化的功能市场、金融市场和传统的集市市场共存；在产权制度和产权关系上，表现为公司制、股份制和私人个体制——夫妻老婆店、小商贩、个体手工业者等并存；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市场化与传统垄断的非市场化并存；甚至在上海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也存在着迥然的差别，如上海城市市区的地价高低差别，极端的差别达496倍<sup>①</sup>，远大于其他城市，从中可见沪地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之一斑。一般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发展过程，内质化二元结构是一种发展形态。一般二元结构随着发展的推进逐步消失，而内质化二元结构在发展中不会消失，反而随着现代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会产生和滋长出新的内质化二元结构，新与旧、土与洋的组合随着发展会扩散至新的领域，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种模式并长期存在下去。这是中国和上海二元结构的第三个特点。

<sup>①</sup> 詹玉荣、谢经荣：《中国土地价格及估价方法研究——民国时期地价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05页。

这种“内质化二元结构”是非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的发展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可以利用和凭借落后国家原有的资源，降低物质成本和社会成本，推进现代化，但同时这也构成后起国家发展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的一大原因。在传统深厚和社会经济各层面极不均衡的大国——中国，这种内质化的发展形态更是一种无法规避和躲绕的历史抉择，直至今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内质化发展模式仍然在起作用；只要现代化尚不能充分地整合与溶解各种落后的状况，现代化的社会同构没有确立，我们的现代化即不算完成，内质化二元结构的发展形态将延续下去。

## 二、关于发展中的协调与不协调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汪敬虞教授曾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命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着发展与不发展，有一定发展而不能充分发展，有局部发展而缺乏整体发展的问题。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发展和不发展问题，在于发展过程中，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条件、发展的路径、发展的关系存在着各种不均衡状态，由此导致发展的水平、发展的效绩、发展的影响不同。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演进运作角度看，任何一种发展都不是简单对应的“函数关系”，而是综合因素合力的共同结果，但发展作为一种事物行进的态势，是否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可能与外部条件、经济关系的协调与不协调。

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可能与外部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协调不协调存在着各种形式。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相适应，两者彼此协调，发展就能展开和实现，如果彼此不协调，发展就难以展开和实现；两者协调得好，发展就比较迅速，协调得不好，发展就比较艰难。有的发展，起步时内在要求与外部条件尚能协调，但发展推进到一定程度时，两者的不协调出现，发展便会减慢、停滞，甚至倒退；而有的发展，开始时并不很协调，但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两者的关系协调起来了，于是发展加速展开；有的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部条件始终不协调，发展也始终难以展开；有的发展始终处于相对和动态的协调之中，它便能持续进行。不同领域的发展彼此存在着互动关系，有的发展的行进和展开成为另一发展的外部条件，拉动了后者的发展；有的领域的发展导致新的相关的领域发展要求的形成和确立，有的发展的停滞却激发了别的领域的超常发展，而有的发展则制约其他方面的正常发展；等等。

开埠以来，中国和上海现代经济的发展充满了协调与不协调现象。这些发展中的协调与不协调勾勒出社会经济的千差万别、色彩杂驳的历史变迁。研究这些发展中的协调与不协调，考察其形成的原因，协调与不协调的状况和程度，发展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发展要求的形成及强弱，发展条件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及其组合，发展协调与不协调的互相转换，发展的正态和变态的演化等等，均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正是在这些发展中的协调与不协调中蕴涵着中国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笔者在若干分析中产生了一些有关上海早期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协调与不协调的思考和认识，不揣浅陋，略作表述，以此抛砖引玉。

1. 上海现代经济兴起时的国内外市场条件的协调与不协调。近代上海是在外力东渐下发生经济转型的。开埠使上海获得了国内外的优势资源，从而得到迅速发展。但上海口岸经济的崛起是在中国内部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条件下被拉曳进了列强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内民族市场尚未形成的状况下卷入了世界市场。在“半边缘”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落后国家开放地区的市场成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一种延伸和扩大，它不能对落后国家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如对贫乏的资本则要求密集地使用。资本主义强势市场的运作规律扭曲和覆盖了落后国家弱势市场的正常独立的运行。上海凭借着“半边缘”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发展起现代经济，但又难以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框定；近代中国开放而没有融入世界，上海现代经济在局部的协调中发展，在整体的不协调中制约了发展。

2. 市场经济结构的协调与不协调。其一，上海现代经济由涉外经济启动而传递至非涉外部门，由外货商业为第一轮扩展部门而发展至替代工业为第二轮扩展部门。上海的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商业服务主要面向贸易流通领域，执行着外国工业化扩展的商业职能。上海的替代工业在商品市场的扩张刺激下兴起，但民族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并不高，始终难以形成以民族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整合。骑跨内外的口岸经济结构，在民族政府力量软弱的条件下，不能深层次地协调本土的工业化建设。其二，在工业行业内部，由于经济的集中化程度过高，结构分布很不平衡，工业化难以均质展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下不仅在于先进行业、先进企业的现代化程度，而且在于改造、消融落后的生产方式、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使社会经济具有均质、协调、快速增长的能力。一二个经济部门的领先相对容易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改造整合则艰难得多，而后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前者大得多。结构性的不协调是制约上海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制度体系的协调与不协调。上海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制度体系，有列强的条约制度体系(包括租界制度)、中国政府工商金融制度法规体系、上海的民间市场习俗规范制度体系、外商的市场制度体系、中国内地的传统的市场习俗规范制度体系等等。这些制度体系在同一个市场的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发生作用。各种制度在彼此的连接中存在许多间隙和缺口，在利益的制约下，有时能够协调，有时不能协调。民国时期的上海，西式的商务活动规则已大致被接受并成为主流式的市场规范，而在内地传统的市场习俗根深蒂固，占据着支配地位。例如浙江的茧行的超经济的垄断，背有地方政府的支撑(茧行承担政府的包捐包税)，将茧农的产品收购价压得很低，而茧农以粗制滥造相抗衡，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上海缫丝业萧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某一种制度维持着某一种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某一种社会经济成分及活动方式支持着某一种制度运行，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制度多元化使制度成本上升，经济运作和社会运作羁绊颇多，市场费用增加，市场无序化现象难以消除。在制度变迁中，诱致性变迁往往推进缓慢，辐射范围小，难以迅速扩大，而强制性变迁，往往失之生硬，不尽符合市场操作，况且制度的安排常常具有制定者的利益倾向性。在制度的运行中，由于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并非均等地承受利益和权利，制度受到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制约；在政治力量不尽统一，市场一体化程度较弱的环境中，制度的一体化难以真正实现。

4. 经济社会变动“量”与“质”的协调与不协调。近代上海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开埠后由一个传统的中等城市变为中国第一的大都市，经济社会的变动的“量”是巨大的。在生产组织方面，新式工商业企业组织大量出现；在社会分层上，新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职员阶层等脱旧而来；在经济社团体上，各色社团层出不穷；在制度变革上，新的工商制度不断形成和颁布，等等。在社会变动中，变革的内容和形式往往并不一致。在原发性市场社会中，先有社会行为的有效变化，后有组织制度的确立，两者比较协调；而近代上海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往往超前于实质内容和角色功能转变，有形的物质形态的改观大大快于无形的功能确立和发挥。“海派”的一个特色便是移木接花，注重形式构成甚于实质内涵。水在不同的瓶子里有不同的形态，实际上这不是水的形态，而是瓶子的形态。由于人的角色转变滞后于组织和制度形态的变化，一些新的形式理性和制度并不能真正地发挥“工具性”的作用。上海市场纷繁杂陈不在于交换货物的千品万种，而在于市场主体性格的多样性和制度多样性所导致扑朔迷离的市场关系；市场关节之复杂微妙，非深入其中之常人常理所能参透。

5. 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的协调与不协调。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政府调控功能缺席的情况下，这种分化尤为严峻。市场和作为市场基础的经济自由，近代上海无疑比内地发展要充分得多，其达到的程度要高些。经济自由具有两面性，它如同市场规律一般，具有释放能量的一面，又有扼制常态下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平等地争取机会的一面。分配制度不仅是对剩余的处理形式，更是一种生产活动的预期规定。剩余分配的资本化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生产的扩大，但劳动力成本的过低化，无疑会影响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在上海工商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社会剩余主要按资本和资源稀缺程度分配，广大劳动阶层的生活水平极少同步提高，在劳动力供给充裕的条件下，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近代上海消费变化中存在有“棘轮效应”（不能逆转），但近代上海工人的工资并不存在如此效应。民国时期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晚清相比，并没有提高多少，有的行业甚至还有倒退。人是社会产品的最终消费者，社会剩余分配的极不平衡使相当多的资金沉淀下来，制约了市场消费需求。一般而言，民族市场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工业化（要素需求扩大）和城市化（产品需求扩大）就是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发育形成的过程，而民族市场的形成将有力地推进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民族市场的形成可以互为前提和衡量指标。在上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上海真正的民众消费市场发展相对缓慢，上海市场的繁荣有相当程度是源于外地游资的拉动。城市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关系没有很好地形成，

经济增长与分配的不协调的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企业生产管理效率的下降。一方面资本家面对竞争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产者的文化知识要求提高。由于劳动者报酬低下，无力进行文化技术进修，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并没有与生产扩大同步提高；而劳动力质量低下、文盲众多，是中国工业化、生产技术升级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中国工业化不及日本工业高度化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已基本上消灭文盲）。

社会分配过度地向资源垄断者倾斜，分配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往往会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不稳定、治安恶化、劳资关系紧张、工潮不息等等。租界经济增长比华界快，但各种案件也比华界多。据统计，1931年盗案、绑案、暗杀案等总数，华界为125件，租界为267件<sup>①</sup>，后者比前者多一倍。而上海帮会对工商金融界豪富的敲诈、盘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社会剩余的一种再分配。

<sup>①</sup> 参见穆超：《再论“全盘西化”》，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7月10日。

此外，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则更多，不一——例举。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它内在的限制，使它无法自我调节，必须借助于外部力量来匡正市场的极端运作和不良走向。然而，中国十分缺乏这种积极的超市

场力量。上海现代经济兴起是市场“自发力量”的产物，其代价是市场理性和社会正义的侵蚀和湮没。

发展是动态的，总是不完整的，总有不协调。对发展中的协调与不协调的考察，人们较多地注意现代经济是如何在本国“协调”地发展起来，而相对忽视“不协调”问题，但从史鉴的作用看，对“不协调”的认识更具价值，更应该深入地研究，因为将不协调整理转化才能使发展接近完整与和谐。

### 三、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思考

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境遇取决于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定位和全球化中的空间定位，这两个坐标决定了它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地位。这种客观的既得的时空条件和地位可以化约为两大方面：后发的优势和后发的劣势。任何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两方面的态势，各民族和地区内部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外部关系有所不同，近代中国和上海呈现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也有个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突出的个性蕴涵着突出的共性。

先看近代中国和上海可能存在着的后发优势。

后发和先进是世界市场形成后的一种相对的现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和市场扩散。现代经济不以需求为目的，在先进国家寻求和“开发”本国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第三市场”的时候，导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国际流动。在这种国际流动中，后发展国家可以利用世界市场获得发展所需的稀缺的国外资源。这些国外资源所蕴涵的后发优势大致上为四点：(1)引进先进的物质生产力，改善和提升本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为后发展国家最为重要的优势。近代上海的市场变革自开埠后发生，但现代经济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此为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引进的直接成果。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享用国外的科技成果，对后发展国家来说，一是极大地降低创新成本，二是极大地节约时间成本。中国在开埠前在生产方面不存在与现代经济的近距离的接力关系，没有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便没有上海等地现代经济的兴起；上海等口岸经济的迅速崛起的一个基本因素，即在于国外先进生产力等资源引进中的优越地位。(2)具有一定的跳跃式发展的可能。就整个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来讲，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不可超越的，它是一个逐步积累发展的渐进过程，因为只能在前人既定的基础和条件下发展创新，“拾阶而上”，不可能凭空跳跃其中任何一代。而具体的某一国家或民族、某一地区，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日益世界化的时代，可以不受国内本国生产力条件的制约，超越某些发展阶段是完全可能的<sup>①</sup>。利用后发的“空白”，选择最新的成果，进行结构转换，可以跨越程式化的发展。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来居上的事例并不少见，近代上海由一个传统经济中等县城发展为远东国际性大都市，即是凭借着衔接世界市场实现的一种跳跃式发展。(3)引进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经营理念，学习和参照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程式规章。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也是极重要的后发展国家的稀缺资源。现代化的推进不仅来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也源于先进生产力基础上新的思想理念的“生产再生产”，新的经济制度的“生产再生产”。近代上海的许多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来自西方，来自对国外的模仿，如银行制度、公司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工业品的营销制度、企业科层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外贸进出口制度、关税制度、交易所制度等均是“进口”的版式。这些制度构成了上海现代经济的制度框架。(4)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规避先行者的错误。借鉴和批评先行者是后来者的特权。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等面对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多有抨击，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主张即来自于对西方社会的反思。但由于中西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缺乏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了解，中国社会对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弊端的鉴戒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失之空泛和疏浅，并没有对中国和上海的现代经济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西方的一些制度弊端，中国和上海不仅存在，有些甚至超过西方社会。

<sup>①</sup> 参见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学

再看中国和上海的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主要在于先进生产技术物质层面的“硬件”和部分“应用软件”的引进，获取国外资源；后发劣势主要在于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外的市场、经济、科技水平、企业经营水平的不利地位和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等方面的不协调。如加以归纳，也有以下四点：

1. 历史条件和发展起点的制约——生产力水平较低，基础薄弱，资本转化不足。后发展国家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普遍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形成了现代化发展沉重的负担。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剩余稀少，不可能大量地购置国外的先进生产力，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在市场作用下，原本稀缺的资金难以均质化流动，二元结构长期僵化。借助于外力突破茧缚，使中国传统经济完成了部分羽化，之所以没有完全羽化为市场经济，即因为在茧内没有完全“蛹化”——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上海经济——在没有完全蛹化的时候，出现了部分的羽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扩散、生产的资本化有所发展，开埠后上海的生产资本化程度(生产迂回化程度)在加深、扩张，但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缓慢。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地租高而农民收入低导致土地价格上升。城市工人工资高，国民收入中工资比例高，导致资本收益率低，从而阻碍工业化发展，使资源配置有利于强化农村租佃制生产方式，对工业中资本代替劳动作了较乐观的估计<sup>①</sup>。这里的问题是，投资工业是否不如农业且不论，工业收入中工资比重是否过高，值得商榷。由于资料的匮乏，近代全国国民所得中工资薪金的比重数值来自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的分配(1933)》一书，主要是1933年的数值。从巫宝三的工薪比重统计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部门，除了金融业(33.5%)外，商业、制造业、矿冶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工资比重等均超过50%。剩余价值中工资的支出具有相对的刚性，由于基本生活消费的限制，越是工资水平低的行业，其刚性越强。在20世纪30年代初叶，工商实业界普遍不景气，相对而言，首先压缩的是企业净利润。从开滦煤矿1904—1936年的年利润和年工资总额统计看，1904—1933年利润总额均高于工资总额。1933—1936年工资总额才大于利润总额。故个别年份的状况不具典型性。即使在某些年

<sup>①</sup> 参见王玉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6期；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份某些行业工资比重高于利润也未必是工资水平太高，也许正相反，是工资所呈现出的刚性。巫宝三的1933年统计中，金融业的工资比重最低，而实际上，金融业的工资水平在现代行业中恰为很高的。因此，认为近代经济发展中工资成本比重上升影响工业化进程恐难令人信服，需要进一步论证。中外比较工人工资的绝对值和相对比重都是很低的，总体上是资本积累赶不上劳动力的供给，分配模式似不会倾向于雇佣劳动者，因为相对而言，资本的稀缺度比劳动力高。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进程在竞争的压力下缓慢地进行，因为其一，中国人口压力大，资源中劳动力廉价是优势。其二，中国现代经济结构为口岸经济模式，商业化过度，投机市场活跃，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其三，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外工业品市场难以开拓。其四，社会不稳定，国内战乱不断。事实上，上海等地的产业结构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仍是高强度、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结构。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国的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进程会继续下去，但不会很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纺织业的一些大厂，而且随着生产资本化的扩展，资本与劳动的选择，始终要受到禀赋特点的制约。

2. 现代经济发展中，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约。模仿性的后起国家同先进的、中心的、创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现代化”成为后者技术、消费方式、文化思想、经济制度的扩散和辐射的过程，而这一切是在根本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普雷维什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走相同的道路，这是后起国家

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的内在缺陷<sup>①</sup>。后起国家往往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体系，政府成为市场角逐中的最强悍的一个“市场主体”，利用权力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专制的清廷、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租界当局等执政者无不把自身的利益放置于社会之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肆搜刮社会剩余。后起国家的社会结构也不尽适应新兴的现代经济。在中国这样传统深厚、历史悠久的国度里，传统的社会结构、封建关系、宗族组织等根深蒂固，非一般的冲击所能化解，这成为内地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理性伸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一种制度或组织在它内在的发展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死亡的，它受到外来新的制度冲击时，情况有所不同，它会加速死亡。这种死亡的速度与外来力量冲击的强度成正比。中国内地由于外来影响的力度小，旧制度死亡的速度放慢，而在外来力量不及的地方，旧制度将是一种缓慢的“自然衰亡”。文化观念的冲突是一种深层的冲突。文化中蕴藏着许多价值信号，根据这些信号，人们决定他们的行动方向和行动方式。在转型社会，不同文化引起的价值抵牾常使人处于困惑之中，无所适从。黑格尔说，是与非的冲突不是悲剧，是与是的矛盾冲突才是悲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就是一种是与是的冲突，从而产生了不少悲剧人物和悲剧事件。传统文化中固然有不少陈旧落伍的东西，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种历史的强制，市场的理性缺陷也将长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制度的融合远远没有形成，其冲突也将长期延续下去。

<sup>①</sup> [阿根廷] 牟尔一普雷维仕著、苏振兴译：《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2页。

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的不匹配，成为近代中国和上海现代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最重要、最广泛的非经济因素。

3. 强大而难以改变的外部制约。后发展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艰难来自双重制约：内部制约因素和外部制约因素。自开埠后，上海“半边缘”市场体系形成，中国经济的变迁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变迁即是中国内在因素使然，也为世界格局所框定。其一，世界市场的制约。世界市场的产品供给中，各国都倾向于生产那些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比较利益，于是产生了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和欠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贸易隐含着不等量的劳动交换。20世纪后日本崛起，中国出口产品进一步跌落，利益流失。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世界分工体系和市场格局，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中国等落后国家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处于不平等关系之中。第四章第一节已论述了中国工农业产品的边缘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外贸条件具有某种恶化倾向，制约国内工业化海外市场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因中国市场发育，进口商品规模呈持续增长之势，外贸逆差不断扩大，国际剩余流向先进国家。其二，技术制约。后发展国家可以通过世界市场获取先进技术，但一般能够获取的仅是二三轮的新技术。现代技术往往由先进国家发源，逐渐从中心向外围扩散，有个时间跨度。在技术扩散中，可转移技术的类别、重要程度、功能价值、扩散方向、购买价格等方面都受到发达国家的主导和控制。对于最新的创新技术，发达国家大都实行封锁政策，以垄断新产品市场。在近代，日本的混纺技术、搪瓷橡胶化工等技术、缫丝技术等都曾对中国或进行封锁或高价索要。其三，外资势力对中国经济和国内市场的渗透、控制和垄断。外资利用是后发展国家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有效方法，但近代中国的外资进入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被动地承受。列强挟持着不平等条约特权，肆意出入中国，占有中国市场。近代进入中国、上海的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集中于轻纺食品等竞争性行业。近代外资输入的性质不是中国经济利用外资，而是外资利用中国资源和市场。这些外资企业的进入虽然在技术扩散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在市场竞争、资本规模、生产绩效等方面对民族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外资企业的过度竞争。落后国家的经济转变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传统经济的分化时期、现代化学步时期、突破时期。近代中国始终没有进入经济发展的突破时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制约是一大因素。

4. 在外力压力下，外激变革引起国内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不稳定、不协调的非经济制约。后发展国家的现代经济发生不是本国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



是外力激发的产物，具有突发性的特点。他激型的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是原发国家所没有的现象。政治、社会、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同构过程在一个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显得尤其漫长。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定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方面问题在前文已有论述，此不再赘。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后发展国家不可避免(除非与外隔绝)地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同时存在，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规避和转化后发劣势往往成为影响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

后发的可能性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将不利的可能降低到最低程度，需与全球化的某种条件和势态结合起来，必须与国内的内在条件和因素结合起来。要达到这一境地，既要靠市场的自在力量，也要靠政府的超市场作用，因为市场不具有宏观的视野。在工业化之前，德国、日本等后发展的西方国家已进行了各种变革：(1)建立民族国家；(2)采取各种措施统一国内市场；(3)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商制度；(4)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增加经济收入；(5)扩大军事力量。在这些变革中，政府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是个历史和时代的难题，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遗传“基因”不尽相同，情况各异，需要寻求适合国情的方式和道路，但努力地创造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外良好的环境这一点应是相同的。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看，政府有所作为的地方很多，应做的事情极多，但概括起来，原则上政府应该在内外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其一，政府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协调国内现代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如近代上海现代经济内部关系的不协调问题，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金融化同时展开而又各行其是，经济整体化在市场浅化中终难以构建。构建复杂的事物需要更多的能量，这需要政府集中一定的经济能量，发挥积极的协调和治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积蓄的能量大量地被吸收和消耗到政治军事方面去了，政府既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也没有发挥经济宏观的协调作用。其二，对外要建立一定的“政府屏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积累循环效应”并非不可逆转，关键是建立“政府屏障”。无论世界经济怎样一体化，利益总是个体的、局部的。政府应用经济杠杆和制度创新阻挡外来的不利影响和冲击，保护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以扭转积累效应的惯性，开创自主发展的局面。近代中国在改革关税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认为后发展国家完全靠市场“自发”的作用，随波逐流地发展，即能改变落后的命运，那未免有些“天真”，因为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内部进行适当的调，以纠正市场的偏失，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建立制约机制，严格地制约和防范政府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并非线性延伸，而是不同时代的文明层叠而成。现代经济中市场是一只“无形之手”，在社会传承中，历史也是一只“无形之手”。历史的蕴藉无处不在，它在悄悄地起作用，甚至制约着我们现今的生活。事物具有多重属性，人认识的深化就是事物多级本质被揭示的过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观照，使人既可以重新认识评判历史，也可以谨慎而理智地审视现实。

如果说百年上海的崛起，可以晚清开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为三大阶段的起始标志，那么19世纪下叶至20世纪上叶的早期市场经济的兴起无疑是第一块基石，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上海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格局。我们现在的经济现代化可以说是早期市场经济的一种继续和进化。虽然这两个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两个时期都处于转型阶段，并且都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发展形态、市场演化、社会变动及其所遇之问题都有不少值得彼此观照的地方。感应时代，感悟历史，对前者历史的分析考察，进行若干理论归纳和理性思考，也许能为我们新时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史鉴”片断。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